

# 教改寻求破解“钱学森之问”

## 核心提示

向温家宝总理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等建议并被采纳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正在试办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在公众看来,他的这块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承载了中国探索高校优质教学、优化管理的希望。

2020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达2亿。尽管数量惊人,但中国高校却不得不面对钱学森生前五六次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诸多方面积弊已久而引起国民不满的中国高等教育,修修补补的改革已无济于事。在此背景下,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起公开征集民意以来,就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

## 教育“去行政化”大势所趋

朱清时认为,《纲要》关键在于高校要去行政化。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校长停下手头工作陪同,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教授发号施令。“如果中国的大学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朱清时说,看到高校去行政化成了国家意志,“感到很满意”,说明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就像当年肯定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对于“去行政化”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问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必须做,这是大势所趋。”他表

示,要从容易的地方做起,试点先行,逐步向难点推进,“大家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试点的出现”。

而朱清时正在深圳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就是这种试点。学校定位是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性大学。其管理工作将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

他说,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他本人已带头放弃副部级的行政级别。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认为,“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高校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南方科大的做法是一种理想状态。当前最要紧的是对高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

## 高考改革凸显多元新思维

对于千篇一律的考试方式,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就给予以批评。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保证公平选拔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一考定终身、唯分数是取的选拔模式却往往导致学校只重视分数,不重视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司司长王建国说,必须坚持高考制度,但他同时指出,高考内容和形式必须改革。《纲要》提出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新机制。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说,本科院校将实行全国统一考试,高职高专院校由各省组织考生招生,高水平大学可以另外加试。同时,《纲要》也明确列出了择优录取、自主招生、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等试点项目。

目前,自主招生已在各重点高校展开。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分别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经过特殊程



美丽的校园(资料图片)

序予以录取。北京大学则开始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

对于有争议的文理分科问题,张力表示,现有的文理科的高考今后将逐渐淡化其唯一性。为表示改革的决心,他向记者承诺,“如果2020年高考仍然是现在这种文理分科的形式,我请你们吃饭。”

南方科技大学在招生改革方面走得更远:高二即可报考南方科大。朱清时认为,学生在高二就基本学完了高中课程,高三就是强化训练应对高考。多读一年书并不能增强学生的素质,甚至可能抹杀了他们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要让有能力的高二学生不要浪费一年时间直接考大学。”他说。

## 期待拔尖人才

钱学森先生生前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发人深省: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

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目前,中国一些高水平大学正在探

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等已取得一定经验。复旦规划进行通识教育、书院制,并计划建立“本科生院”,进行通才式教育。

但这些措施仍远远不够。《纲要》在高等教育提升工程中特别指出,要实施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基础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本着少而精、高层次、国际化的原则。国家已选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学科率先试点。

张大良列举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七个方面,其中包括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将最优秀的学生选入到培养计划中;安排高水平专家学者担任专业导师和授课老师;突出个性化培养,让学生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等等。

朱清时说,南方科技大学“很可能”是这十几所大学其中之一。承担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重任,确实感到如履薄冰,但一定会义无反顾,从面试每一位考生到高薪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加盟,进而精心设置院系,培养出社会高度认可的拔尖人才。毕竟,教改要让人民看到希望。

据新华社

# 学生职业理想调查: 企业家居首 科学家倒数第3

“我在一个城市的两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学生中进行了理想职业问卷调查。在9个可选择的职业中,科学家排在第七,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正在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说,“这样的结果让我无语,让我哽咽。”

王庭大先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高三学生职业理想调查,文科考生4207人,理科考生3630人,热门理想职业依次是公务员、律师、医生、记者等,前几位唯独没有科学家。王庭大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亲自调查一番。他选择了北京市两所中学和两所小学1180名学生,列举了9个备选职业,就“长大最喜欢从事的职业”进行调查,结果排名第一的是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科学家排第七,农民、工人排名最后。

会上,在题为《全社会都要关注科学技术关注科学家》的发言中,王庭大发问:“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青少年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长大了也不愿当科学家,那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发展,中华民族怎么能振兴?”

王庭大强调,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家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当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之时,开国元勋们首先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我们不会忘记,是“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基础和世界大国的地位;是陆相成油理论甩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是杂交水稻为满足中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生产的“金钥匙”;是载人航天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必须适当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要让科学家成为最受尊敬的人。”王庭大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家是最重要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对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决定着

一个民族的兴衰。我要大声疾呼——全社会都要关注科学技术、关注科学家!

在上海代表团小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场,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生物化学家王恩多道出众多科研人员的无奈,很多科学家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的不是科研,而是怎么避免科研项目因经费预算不合格而被卡掉!

“这说明科研大环境也有待改善。”王庭大说,早在1956年,中央就要求要保证科学家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现在很多人连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能保证,这些科学家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琢磨怎么跑项目找经费。“让科学家用大量的时间去争取科研经费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犯罪!”王庭大疾呼。

2009年,钱学森、贝时璋两位科学界的泰斗相继离世。人们在深感惋惜时往往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如今的科学家中鲜有杰出的大师级人物?

“不是没有,而是挖掘和宣传得不够。”一个故事让王庭大遗憾至今:在中科院海洋所有一位海带专家,常年坚持在一线进行研究,我们国家这么多人通过食用海带补充人体所需碘,成功预防甲状腺肿大等疾病,这位海带专家功不可没。“可这位科学家直到逝世,也没有多少媒体来关注他”。王庭大说,美国电视台的科技节目占总量的20%,日本是15%,而中国仅仅6%。

王庭大建议筹建国家科学网站,加强对科学家的宣传,像当年宣传陈景润那样宣传当今科学家,像了解尊重老科学家那样了解尊重当今的青年科学家,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目中留下科学家可敬可爱的形象。热爱科学的教育要从中小抓起,王庭大建议设立科学公园,向孩子们宣传科学知识,宣传科学家的事迹、科学家的精神,让科学家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据《中国青年报》



校园一角(资料图片)

## 保障房不是变来变去的万花筒

“两会”关于房地产的讨论不外乎两个,一是高房价,二是保障房。对于政府应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保障房这点,各界都没有异议,但对于什么是保障房,则分歧很大。

在“两会”期间,值得注意的有关“保障房”的新闻有两条:一是深圳某经济适用房小区豪车扎堆,本田、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等豪车70多辆,引发了对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新一轮争议;二是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北京将逐渐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今后公租房在北京的政策房中将占主导地位”。

北京确定将公租房作为未来保障性住房的主导供应模式,在全国算是首创。

北京之外,其他城市对于保障性住房如何界定和规划,情况各异,有些地方以经济适用房为主,有些地方以廉租房为主。应该说,在保障性住房主要由各地财政自行负担的情况下,各地根据自身的财力确立保障性住房的类别和范围,的确无可厚非,特别是在“住房保障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探索,对我国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多元住房保障体系,大有裨益。

然而,也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各地又苦于财力困难,千方百计地削减保障性住房的种类和保障的范围。比如,对于1998年就开始探索的经济适用房,不去探求从制度上进行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不愿为经济适用房免费划拨土地而公开反对经济适用房,使得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大幅削减。

在2009年,住建部提出今后三年内要新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总投资将达到9000亿元。但在执行的时候却少见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计划,使得经济适用房供应几乎“空转”。

对于保障房究竟应该包含哪些,一些学者更是认为保障性住房全世界只有廉租房一个类别,不顾英国、日本、新加坡都有给予产权的保障性住房的事实。在各地廉租房建设刚刚起步的情况下,贸然砍掉经济适用房,结果就是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大大延缓。

其实,今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即“国十一条”)第一次明确了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类别。明确指出“要适当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扩大经济适用房供应范围”。商品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切实增加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同时将我国的保障性住房类别明确为:限价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四类。

的确,在当前房价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绝大多数民众缺乏购买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类别,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保障制度不仅符合国情,且符合民生的需要。保障性住房是个“筐”,但一定不要让这个“筐”无菜可装。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需要探索,但千万不要今天将这个作为重点,明天又将那个作为重点,变来变去,成为一个谁也搞不清楚的万花筒。从这个意义上说,制订“住房保障法”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新论

## 50个说情电话是议案的价值

12:00,当手机时钟显示出这一行字时,全国人大代表陈仲的心放下了。这是本届全国人大会议提交议案的截止时间,陈仲提交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从这时起开始有了“生命”,没有任何力量能让这份议案撤回。自议案提交之后,陈仲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接到超过50个的“关心”电话,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被面谈”。

陈仲所提交的议案,正是近年来公众关注度极高的焦点性议题。《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该法条文太少,规制内容太过简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本计划在实施前制定的数十个配套规则,至今仍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还有,该法在国内高垄断问题上没有摆脱鲜有积极作为的困窘,一直以来也饱受公众所诟病。

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历史来看,涉及关键利益问题,不仅仅在垄断行业,许多阶层均不可能袖手旁观,它们需要各种力量公开公平博弈。在现阶段的条件下,“两会”无疑是各方力量重要的博弈平台之一。而从委员代表参政议政责任来看,关注《反垄断法》乃是应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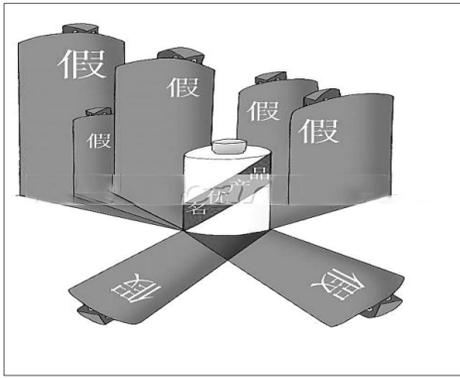
在公众难以对垄断行业形成有效抗衡和反制的情况下,委员代表发挥的影响力,实际上承载着民意与垄断行业博弈的更多重任。这也就是讲,在“两会”垄断问题的博弈舞台上,坐在垄断行业另一头的理应是委员代表。博弈力度越大,越能赢得更多民意。当然,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垄断行业利益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50个说情电话正是给陈仲议案“含金量”打下的分值。

朱刀



让腐败见阳光 范建平绘



假冒伪劣商品如影随形 王平之于绘

## 离婚难能降离婚率吗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离婚手续太简单是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离婚时增加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书。(3月10日《重庆晚报》)

这位代表的论据中存在两个常见的误区,如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等早就指出过的:一是与长期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离婚率尽管在增长,但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婚姻家庭仍是普遍稳定的;二是离婚程序繁简与否和离婚率没有必然的联

系,离婚程序非常简便的日本,离婚率并不高,而离婚程序的复杂并没有影响美国离婚率居世界第一。

降低离婚率的愿望,反映了维护婚姻和谐稳定的传统思想。但是,从法治和权利的角度看,离婚是婚姻自由的一种,在感情破裂、一方犯下严重过错等情况下,离婚不是一种应有的自主权,还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应受鼓励的选择。至于离婚后当事人及子女受压力的现象,恐怕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由离婚,而是人们对离婚和单亲家庭的偏见造成的,这恰恰提

醒我们应避免将离婚简单负面化。

《婚姻法》已经有了离婚过错赔偿、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多分财产、对生活困难者应予经济帮助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够,应该引起重视。

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撇开良好动机不论,苛刻一点评价的话,这一建议其实是莫名其妙,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而且,其中还有一种限制公民自由、扩充权力的倾向,这就更有必要对它进行严格的挑剔了。 吕频

## 读懂预算报告 才有阳光财政

今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报告长达80页,账目更为详细,且配备了五大本说明书,这也许是两会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文本。未承想,预算审议却没有出现热烈的场面。据央视《新闻1+1》等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说,在小组分组审议中,“没有一个人谈到预算报告”。

国家财政预算报告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政府在过去一年里钱都花哪里去了,怎么花的,下一年准备怎么花?这涉及人大监督的核心,如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所言,是监督政府最为实质的一环。虽然预算报告从几年前仍属于“机密”文件到如今人手一份,财政预算公开化改革已有很大进步,但是,不足也很明显:一是文本不好读,二是留给代表委员们讨论审议的时间太短。

这里既有专业性的难题,也有程序安排的原因,还有着观念方面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老话题。道理大家都明白,每年两会期间这事儿都备受关注。连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都认为,政府预算公开的实际执行情况不令人满意。尽管各方都有一定共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取得关键性突破。有句俗话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推动财政预算阳光化的进程大抵也是如此——相关讨论和建议要么停留在“应该如此”的理想化层面,要么老调重弹,每年都把陈腐端上桌。

这说明,财政预算公开化改革,需要一股强大的动力来推动前进。这个动力若非来自于政府本身,只能是向外寻求。能够对这一改革形成压力,起到鞭策作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

英国有一句格言:无代表,不纳税。意思是没有人民代表的同意,国王不能征税;换言之,没有人民的同意,人民可以不纳税。这句口号曾经掀起几多风起云涌的历史大事件,这里不详述。需要指出的是,这句口号蕴含的道理并不这么简单。征税及其开支均涉及纳税人的钱,当然都要获得人民代表的同意。这就是说,人大代表完全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财政预算报告,而这就包括公开多少、如何公开以及公开后如何开支等方面的内容。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理由,而且也应当充分履行自身职责,推动和实现政府财政预算阳光化。这份报告不仅要看得懂,还应安排足够时间,比如提前发放报告文本,以便代表们认真审议。总之,这是代表们的权利,也是不可推卸的职责。如果有人因为报告不好懂或时间不够而放弃这一权利,就等于放弃自身职责。

推动财政预算阳光化的控制器其实就在代表们自己手里——当然,归根结底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手里。 英子